

应当从速确立以开发太阳能为核心的能源长期战略

■ 应宜逊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教授

目前,我国在能源使用方面存在两个大问题:一是耗量大、效率低。2012年,我国的人口占全球的19%,GDP占全球的10%,能源消耗总量却占全球的25%,单位GDP的能耗是全球平均值的2.5倍(是美国的3.3倍,日本的7倍)。二是能源结构欠佳。2012年,我国消费一次能源折合标准煤(按7000千卡吨计算)36.2亿吨,其中,煤炭68.5%,石油17.7%,水能7.1%,天然气4.7%,核能0.8%,其他1.2%。也就是说,对环境污染最厉害的、“肮脏”的煤炭占了近70%,而可再生的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清洁能源仅仅占1%多一点(水能对环境的破坏很厉害,算不得清洁能源);同时,油气的进口比例太高,超过一半,业已成为最大的进口国,战略上很不安全。综上,我国在能源领域面临两大任务:①努力降低单位GDP能耗;②调整能源结构,大幅度降低“肮脏”能源比重、提升清洁能源比重,降低油气的进口比例。后一项任务更为迫切、重要、艰巨。

调整、优化能源结构要遵循两项原则,一要依据国内能源资源的禀赋,尽可能“扬长避短”;二要有明确、坚定的长期战略,能够持之以恒。国际上,美国的能源结构调整是较为成功的。原来,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对中东石油有着强烈的依赖,经济上、战略上都甚为被动。为了改变上述格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就致力于执行以开发国内丰富的页岩气(储量占全球13%)为核心的长期能源战略;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形成成熟的开采技术——水力压裂法,进而,使得这种比石油

去年(2013年)冬季以来,出现在我国的大范围、高强度、长时间的雾霾,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我国的能源使用结构必须作根本性调整。

更干净的能源实现了商业化生产,产量突飞猛进。2012年,美国的页岩气产量占天然气的37%;2015年,美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2020年,美国将成为油气净出口国。

虽然,我国有着比美国更丰富的页岩气资源(储量占全球19%),但是,我国的能源结构调整不宜简单地搬抄美国做法,走以开发页岩气为核心的道路;而应当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选择长期效果更好的道路,这就是以开发太阳能为核心的道路,并且用15—2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或者基本实现。主要理由如下:

1. 我国的页岩气埋藏较深,地质状况远比美国复杂,不能简单地依靠引进美国技术来开采,而需要继续“自主创新”;同时,使用“水力压裂法”开采页岩气需要消耗大量的水,而我国是缺水国家,水资源贫乏,难以承受这种消耗。

2. 我国拥有全球最丰富的太阳能蕴藏。在面积约60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藏北高原,年日照时数超过3200小时,单位面积的年太阳辐射总量超过200千卡/平方厘米,最高的地区甚至达到260千卡/平方厘米。如果光伏技术的转化率达到20%,那么,面积1平方公里的太阳能电

池板,一年中所发出的电能便相当于4万吨石油(热值以10000千卡/千克计算)或者6万吨标准煤。如果到了2030年,我们开发利用了藏北高原的1/10,即6万平方公里,便可以获得相当于36亿吨标准煤的能源,大体与2012年我国消费的一次能源总量相当,能源结构调整显然大功告成。

3. 太阳能比页岩气更清洁,又是可再生的。当太阳能成为能源结构中的主力后,煤炭、油气便主要地作为原料来使用,耗电量大大减少;汽车则主要依靠电或氢(由电能转化)来驱动。这样,不仅能够使我国的生态环境尤其是空气质量得到极大的改善,而且还可以把宝贵的油气资源更多地留给子孙后代。如果我们做到了以太阳能为核心,那么,不但对中华民族是极大的贡献,而且对全世界也是极大的贡献,其历史意义远远超过美国的能源结构调整。

4. 以太阳能为核心的长期能源战略是能够实现的。目前我国已经拥有全球产量最大的光伏行业,技术水平也已经相当不错,比如,安徽省某光伏企业生产的效能最高的一款产品的转化率已经达到41%,因此,20%的转化率是完全可以期待的。在高压输电方面,目前我国的技术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部分电能也可以需要就地转化为氢,这在技术上已经不是问题。至于资金,则更不是主要问题。诚然,藏北高原的自然条件比较严苛,但是,比起北极圈内的美国普里霍德湾(阿拉斯加州北部的石油基地)与原苏联诺里尔斯克(镍与多种有色金属基地),还是要强许多。因此,用15—20年时间,实现或初步实现这一长期战略,应当说是可行的。同时,还应看到,藏北高原只是这一战略



计划中的“航空母舰”,还有青海、新疆、河西走廊等地区“巡洋舰”,以及全国其他各地的“护卫舰”、“鱼雷快艇”。

5. 实行“以太阳能为核心”的长期能源战略,还可以收到许多其他的重要效果。比如,我国将成为能源出口大国,而且是清洁能源出口大国;尤其是可以向韩国、日本提供大量清洁能源——氢与电,这将十分有助于提升我国在亚太的战略地位。又如,开发藏北高原的太阳能,乃是一场真正的“西部大开发”,对于西部发展及巩固边防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再如,我国目前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如果我国实现了以清洁、可再生能源为主的低碳消费,则国际影响之巨大、国际威望之提升,肯定是“冲击”性的。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正需要来一次这样的“冲击”!

总之,这是上天赐福给中华民族,赋予我们一次极好的机遇,我们必须抓住它!

全球市场止震,中国最关键?

■ 拉尔夫·阿特金斯

今年伊始的故事似乎很简单。有关世界经济复苏的乐观情绪推动股市上涨;随着美联储(Fed)缩减资产购买规模,普遍预计美国国债收益率将小幅走高。投资者据此调整了头寸。

但随后的情节发展出现令人意外和不安的曲折。2014年刚过去5周,市场(尤其是在新兴经济体)再起风波。富时全球指数(FTSE All-World index)累计下跌近5%,而日本的日经225指数(Nikkei 225 index)下跌了13%。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非但没有上涨,还下降了差不多0.5个百分点——这在一个通常稳定的市场是相当大的变动。

那么,是什么地方出了错?投资者得到许多不同的解释(这很可能加剧了他们的神经紧张),而央行史无前例的货币政策实验使情节更加扑朔迷离。市场波动显示,投资者的不确定感急剧上升:不知道这仅仅是一次回调,抑或是下一场金融危机的早期阶段。

为了方便读者梳理头绪,以下是一份简短的指南,介绍一些市场思路,以求诠释形势为何逆转,但世界末日未必近在眼前。

【反推力】

起初,我们看到美联储的缩减计划加剧新兴市场的“特殊”困境。阿根廷央行决定停止支持比索,导致这种货币的汇率暴跌,在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产生冲击波,尤其是那些最依赖外国资本的经济体(原因是美联储的行动可能挤压外债流动)。这些问题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们达不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规模,而且局限于少数几个存在明显弱点的国家。

但是,投资者情绪受到的负面影响出现蔓延。借用央行的套话,我们看到的是美联储近期行动所引发的广泛“逆向投资组合再平衡效应”。

在危机年份,量化宽松刻意驱使投资者进入风险较高的资产或行业,如股票和新兴市场。从逻辑上讲,美联储在去年12月宣布的逐渐减少资产购买的决定,将导致这一过程发生逆转。这似乎已经发生了。随着投资者搜索更安全资产的避风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收益率(与价格走向成反比)下降。我们看到一个广义的“避险”市场,这种现象通常标志着全球金融危机进入下行阶段。

但是,如果“反向投资组合再平衡”或“避险”成为主旋律,欧元区外围那些受到危机打击的国家的债券市场怎么没有出现显著的抛售呢?西班牙和意大利债券是投资者“追逐收益率”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今年迄今涨势基本上没有中断。

【太多的共识】

一种解释是,欧元区的前景有所改善,以至于其外围经济体的债市也成了相对安全的避风港。另一种解释是,在去年强劲上涨之后,美国和欧洲股市本来就随时可能遭遇回调。

近日与我交谈的一些市场策略师感到后悔的是,事后看来,他们未能看出年初各方在2014年形势将如何演变上的共识达到了危险程度。当投资者像羊群一样行为时,最聪明的投资者获利离场;其余投资者争相效仿。

新兴市场动荡可能提供了股市回调所需的触发因素——当然这也可能是美国的疲弱经济数据,这些数据令人对美国复苏的强度和美联储缩减的时机产生疑虑。

这里是另一个次要情节:美国经济活动指标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在形势不妙时,这永远是一个便利的解释);1月份,美国大片地区笼罩在冰冷的极地涡旋之下。

在发生这一切的同时,隐藏在背景中的不祥迹象是,人们担心中国经济增长失速。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偏弱,加剧了今年的市场不安。更令人震惊的是不久前中国一家信托基金公司几乎违约。虽然有关方面在最后一刻阻止了违约,但它留下了有关中国打算如何控制其庞大影子银行体系的大问题。

目前中国正受到市场最密切的观察。其他大部分故事情节是暂时现象,可能会淡出——尽管美联储未来几个月缩减的影响仍不清楚。但事实可能证明,中国政府稳定本国经济的能力,对于防止一场严重得多的全球抛售、对于确保金融市场在2014年的故事没有一个不愉快的结局都至关重要。

(FT 中文网)

美国贸易谈判“快速道”有名无实



■ 奇普·罗尔·泰德·鲍斯纳 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法律顾问

对一些人而言,拟议中的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贸易协议的前景似乎已然黯淡。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参议员哈里·里德(Harry Reid)宣布,他反对讨论旨在恢复国会“快速道”(fast-track)批准这类贸易协议的立法议案。在最近一个闭门会议期间,众议院民主党人据报道表达了类似的反对意见。以往的“快速道”法律在自1974年以来美国签订的几乎所有重大贸易协定中起

到了重要作用,但该法在6年前失效,至今未被新法接替。

这令贸易协定支持者感到恐慌。但情况不应如此。“快速道”授权搞到后来附带如此繁多的条件和官僚程序,以至于现在相对于常规立法程序没什么优势。

“快速道”谈判授权出炉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旨在帮助应对这样一个风险: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将导致贸易谈判出现僵局。只有总统可以与外国政府谈判,但实施协议需要通过法律,只有国会有权这么做。“快速道”理应解决这点。美国国会将提出一个目

标清单,总统将追求这些目标,在此过程中与立法者和商界领袖磋商。然后,实施由此产生的协议的立法将交由投票表决,没有修改提案或阻挠提案通过的可能性。这保证了总统能够履行承诺,提供与外国领导人谈判所需的可信度。

对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东京回合谈判而言,这一安排发挥了较好作用。该多边协议于1979年达成。美国在1985年与以色列、1988年与加拿大签订协议时,这一安排也有效发挥作用。这些协议都在国会高票获得通过。但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以及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缔造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协议开始,这一程序所基于的政治共识开始削弱,贸易协定以微弱得多的票数之差在国会获得通过。

过去10年,美国与哥伦比亚、秘鲁、韩国和5个中美洲国家以及多米尼加共和国达成的贸易协定,都在国会遭遇“快速道”旨在防范的那种障碍。在谈判正式结束很久以后,美国不得不做出重大修改。在美国与哥伦比亚签订的协议首次由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提交国会时,众议院甚至修改了规则,让实施该协议的立法脱离“快速道”。

在这种背景下,里德和民主党其他领导人的警告不应令人意外。如今,贸易协议不

仅涉及进口关税问题。它们还包括有关知识产权、金融服务监管、食品安全标准以及其他问题的承诺。这些承诺不仅会制约联邦法律,还会约束州和地方政府的行为。立法者希望仔细审查这些措施是可以理解的——指望它们会轻易得到批准是不切实际的。

“快速道”程序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现在它带来的麻烦可能超过了价值。要从国会获得特别谈判授权,总统可能必须首先同意一个长长的限制性条件的清单。这些条件将是公开信息,因而将削弱总统的谈判地位。与其接受条件、阻碍总统为美国人民谈判达成有利协议的努力,不如在没有特别授权的情况下展开谈判。

任何协议都可能会在国会遭遇障碍。但如果协议细节公开而且美国人能够看到批准该协议将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那么清除这些障碍将变得更为容易。

相比之下,与国会就“快速道”授权角力可能代价惨重,而且毫无意义,因为协议达成后,这个问题还需要重新考虑。如果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希望在贸易问题上实现进展,那么他应当开始致力于达成一项国会人支持的协议。(本文作者是威嘉律师事务所律师Weil, Gotshal & Manges) 合伙人,曾担任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和美国国会贸易委员会的法律顾问)

(FT 中文网)

中国楼市难题的深圳样本

■ 迪米

在深圳一套顶层豪华公寓的屋顶上,暴晒着几十条小鱼。这套公寓已挂牌出售,价格比2012年上一次易手时高出大约20%。

这套公寓位于深圳最昂贵的小区之一波托菲诺(Portofino)。眼下其屋顶被邻居占用来晒鱼。业主正等待一个买家支付4000万元人民币(合660万美元)买下这套公寓。这套“土豪”(中国人用来调侃新贵的一个词)公寓最初在2007年以1800万元人民币出售,随后在2012年又以3300万元人民币出售。其内饰包括花哨的吊灯和深红色的家具。

过去7年里的这一价格飙升,凸显出中国房地产市场令人晕眩的价格上涨已从北京和上海蔓延至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华南的广州和深圳。

中原地产近日表示,1月深圳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上涨18.2%,仅次于三个上涨最快的市场(北京、上海和广州)。

中原地产(Centaline Property)中国大陆区总裁赖国强(K.K. Lai)表示,深圳市场火爆,是因为科技和电子商务等行业的企业云集该市。富士康(Foxconn)、华为(Huawei)和腾讯(Tencent)的总部都没在深圳,而邓小平在1979年启动经济改革时,这里只是一

个渔村。“这里有很多大富豪……在深圳,豪宅要卖到香港的价格,”赖国强表示。

中原地产的数据显示,去年深圳出售了4.8万套新建住宅,均价达到每平方米21626元人民币,比上月高出14.5%。二级市场的涨势更为迅猛,均价上涨逾1/5,至每平方米2.73万元人民币。

深圳房价的上涨是中共在全国面临的一个问题的缩影。住房价格飙升正使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因根本买不起房产而退出市场,由此引发有关维护社会稳定的担忧。但是,考虑到房地产在推动建筑支出以及作为银行抵押品方面的核心作用,为市场降温的努力有可能造成硬着陆,危及中国经济。虽然中国中央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以刺激住房供应,抑制投机性买房,但许多措施还没有完全落实。

深圳是中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之一,年人均收入达到6.4万元人民币。但即使如此,据中原地产介绍,购房者也得拿出20倍于这个数字的资金才能买房。年轻夫妇往往只能在两个人都工作的情况下才买得起自己的安乐窝,而且即使如此,也要每年支付9.6万元人民币偿还抵押贷款。

拥有一家时尚企业的欧阳嘉利(Carrie Ouyang, 音译)属于比较幸运的人。2010年,她以每平方米1.6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在深

圳新经济区前海附近买了一套100平方米的公寓。如今该地段类似公寓的售价为当年价格的175%,使其成为深圳涨势最陡峭的市场之一。

欧阳表示:“大多数人都觉得很难买得起。”她身旁坐着她的朋友余咪(Yumi, 音译),余咪和人共同拥有一个名叫Rapsalions的酒吧,但尚未成功购房。

中原地产的赖国强表示,当经济移民来到深圳时,“他们的第一个梦想是能有自己的房子……(但)一般人实现不了这个梦想”。

美联物业(Midland Realty)深圳及惠州董事总经理江少杰(Samuel Kong)表示,当地市场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央政府出台的4万亿元人民币刺激计划的推动。

深圳自2010年以来出台了一些降温措施,包括限制非居民可以购买的住宅数量;据江少杰介绍,此举有一定效果。但他指出,深圳没有落实中央政府去年出台的其他一些措施,部分原因是它们对地方财政收入有潜在影响;当地政府正在建造多条新的高速公路和一座新机场。

然而,中原和美联储两家都估计,深圳今年可能会效仿上海和重庆,开征房产税——尽管这些税的适用范围迄今非常有限。

江少杰和赖国强都认为,有一个举措可



能对高端市场产生重大影响,那就是高层可能要求政府官员登记名下拥有的房产。

中央政府在2012年誓言推进该政策,可迄今尚未落实。但有越来越多的人猜测,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多方面的努力打击腐败,中央政府可能最终会采取行动。

“这必将对房价产生影响,因为我们可以想像,很多官员很可能有很多房产不是用自己的正式收入买下来的,因此他们将试图在这项政策实施之前卖掉房产。”江少杰表示,“该政策原定在2013年推出,但许多地方政府抵制它。”

赖国强表示,这将促使大量资金从楼市流向其他领域,因为政府官员拥有深圳的大多数豪华公寓。

“就凭他们的工资,名下有这么房产肯定是非法的,因此他们只能抛售。”赖国强表示,“卖掉房产后,他们会去买钻石,买你无法估算其价值的东西。”

(FT 中文网)